

宁波方言功能词变调及与句法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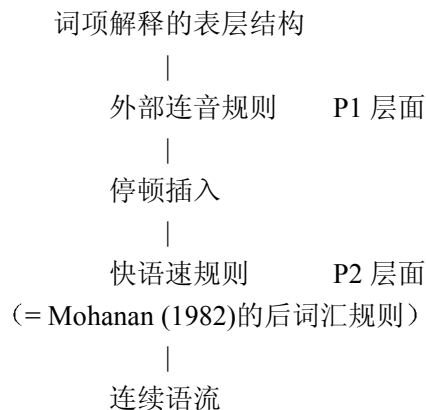
胡方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1. 理论背景及导论

在词汇音系学 (lexical phonology) 的理论框架中 (Kiparsky, 1982, 1985; Mohanan, 1982, 1985; Pulleyblank, 1986 等), 音系学可以分成两个组成部分: 词汇音系学和后词汇音系学 (post-lexical phonology)。词内规则 (lexical rules) 应用在词项 (lexicon) 内, 后词汇规则 (post-lexical rules) 跨词界应用。词内规则不受停顿插入 (pause insertion) 的影响, 而后词汇规则会受到停顿插入的影响。跨词界的音系规则必须发生在后词汇阶段。但 Kaisse (1985) 指出: 有一些外部连音规则 (external sandhi) 明显是后词汇的, 因为它们跨词应用, 但它们受句法信息的影响却不受停顿插入的影响。Kaisse 指出外部连音规则与受形态影响 (morphology-sensitive) 的词汇规则类似。Kaisse 因此提出外部连音规则应该纳入“词项插入与停顿插入之间” (第 15 页) 的模块中。在 Kaisse 的模型中, 后词汇音系学被划分成两个层面。其一是 P1 层面, 包括外部连音规则, 是受句内词间的结构关系影响的。其二是 P2 层面, 快语速规则 (fast speech rules) 在此应用。Kaisse 的模型如下 (1) 所示:

(1) Kaisse 的模型 (1985, 第 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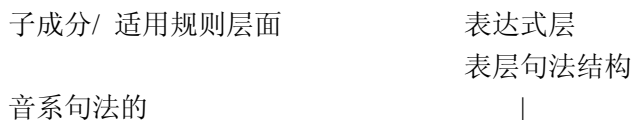
在 Kaisse 的理论系统中, 句法信息直接进入 P1 层面的音系学, 这被称为直接句法接口理论 (the direct syntax approach)。根据对 Kimatuumbi 语短元音化、法语连颂、汉语普通话连续音变、Ewe 语连续音变等现象的分析, Kaisse 认为外部连音规则应用域可以用句法关系来定义, 也即是她所提出的域成分控制关系 (domain c-command relations):

(2) 域成分控制 (Kaisse, 1985, 第 159 页)

在结构 $[X^{\max} \dots \alpha \dots]$ 中, X^{\max} 被定义为是 α 的域, 那么, α 成分控制域内任一 β 。

与 Kaisse 不同, 短语音系学另一有影响力的模型是由 Selkirk (1986) 所提出的。Selkirk 认为句法不能直接进入音系。在句法结构和语音表达式之间还有两层表达式: P 结构 (韵律结构) 和 PI 结构。与 Kaisse 类似的是 Selkirk 也区分两种类型的后词汇规则, 即音系句法规则 (phonosyntactic rules) 和纯音系规则 (properly phonological rules)。音系句法规则是 P 结构前规则而纯音系规则是 P 结构后规则。Selkirk 的模型如 (3) 所示:

(3) Selkirk 的模型 (1986, 第 375 页)





Selkirk 的基本设想是在句法和音系之间有一个中介层,即韵律结构。因此,象 Kaisse (1985) 中认为是直接受句法结构影响的规则在 Selkirk 的理论中就被理解成是受 P 结构影响的。至于韵律结构的推导, Selkirk 借鉴了 Chen (1985) 对厦门方言音系与句法关系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边界条件理论 (end-based theory), 如 (4) 所示, 它主要是两项参数的设定:

(4) 边界参数设定 (Selkirk, 1986, 第 389 页)

- | | | | |
|---------|-------------------|----|--------------------|
| (i) a. |]Word | b. | Word[|
| (ii) a. |]X _{max} | b. | X _{max} [|

参数一决定域的层级, 即根据句法范畴的层级决定是词 (不包括功能词) 还是最大投射项; 参数二确定是右边界还是左边界。根据 Selkirk 的理论, 韵律结构有以下属性:

(5) 韵律结构的属性 (Selkirk, 1986, 第 384 页)

- (a) 包含不同类型的韵律范畴, 如音节、音步、韵律词、韵律短语、语调短语、话语。
- (b) 对任一韵律范畴, 句子都被穷尽性地分析成此一范畴的序列。
- (c) 韵律范畴是有层级的, 在音系表达式中, 它们是严格地按照层级组成不同的范畴层的, 也即是相同层级的韵律成分是不能内嵌的。
- (d) 韵律范畴的按层级排列是合格的排列 (a well-formed bracketing)。

上述特性要求一个句子被穷尽性地分析成有层级的韵律层序列, 如 (6) 所示:

- (6)
- (_____) 话语
- (_____) (_____) 语调词组
- (_____) (_____) (_____) 韵律词组
-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韵律词
-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音步
-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音节

音系学家并不完全赞同上述韵律层级划分。Hayes (1984)、Nespor 和 Vogel (1986) 提出应在韵律词和韵律词组之间有一附着组 (clitic group, CG)。Zec (1988) 认为韵律层级最低组成结构应为莫拉 (mora, μ)。上述之属性(c)被称之为严格层级假设 (the Strict Layer Hypothesis) (参见: Selkirk, 1984; Nespor & Vogel, 1986; Hayes, 1989)。不过许多学者指出, 严格层级假设并不是一个普遍原则, 因为有一些语言允许韵律递归现象 (如: Ladd, 1986; Odden, 1987; Hyman et al., 1987 等)。

在对汉语及各方言的声调及变调研究中, Chen (1990) 和 Zhang (1992) 认为句法和音系的接口关系可以是直接的, 也可以是间接的。句法结构和韵律结构之间的映射可以是边界决定的、可以是关系决定的、也可以是两者都起作用。Zhang 指出在韵律层级中, 语调词组以上的韵律单位是以焦点为基础的层级 (focus-based hierarchy), 韵律词与韵律词组之间的韵律单位是以形态句法为基础的层级 (morphosyntax-based hierarchy), 音步以下的韵律单位是以响度为基础的层级 (Sonority-based hierarchy)。在以句法为基础的韵律层级中, 各种句法条件, 如功能关系、空语类、分叉不对称性、c/m-command 条件、直接成分分叉、边界条件、等等, 都可能影响音系。Zhang 指出句法和音系之间的映射是“一个韵律结构根据句法信息编码的过程。”

本文拟在短语音系学的框架内讨论吴语宁波方言功能词的变调，及与句法之关系。第2章介绍宁波方言词汇层的连读变调，第3章描写宁波方言功能词变调现象，指出其与词汇层变调不同之处，第4章应用短语音系理论解释宁波方言功能词变调的规律，第五章是结论。

2. 宁波方言词汇层变调

2.1 单字调

关于宁波方言有多少个单字调一直众说纷纭，最多有报道是八个，最少是四个（参见：Chao, 1928；施文涛，1979；傅国通等，1985；Chan, 1985；汤珍珠等，1990；钱乃荣，1990；徐通锵，1991；陈忠敏，1993）。据本人调查，宁波老派单字调是七个，即阳上与阳去合，但已不多见，现在主流的是六个单字调，即阳平、阳上和阳去三个阳调合，最新的有些年轻人有显示阴平与阴去合的趋势，也即是和镇海方言一致了，因为镇海就是五个声调¹。本文所用的主要发音人是六个声调，见（7）所示：

(7) 宁波方言单字调²

- | | | |
|---------------|---------------|---------------|
| 1. 阴平 51 (HL) | 3. 阴上 34 (MH) | 5. 阴去 44 (H) |
| 6. 阳去 13 (LM) | 7. 阴入 5 (H) | 8. 阳入 23 (LM) |

2.2 词汇层变调

宁波方言的声调系统正处于变化之中（参见徐通锵，1991），因此常呈现出一些不规整的现象。对于连读变调而言，同一类型声调组合可以有多种表层变调形式出现，甚至一个多音节词都可以有不同的连调形式（参见汤珍珠等，1990；钱乃荣，1990；汪平，1990；等）。

(8) 宁波方言词汇层变调表

首字调类	单字调	两字组	三字组	四字组	五字组	
阴平 (T1)	HL	M-H	M-H-H	M-H-H-H	M-H-H-H-H	
		M-HL	M-H-M	M-H-M-M	M-H-M-M-M	
			M-H-L	M-H-L-L	M-H-L-L-L	
			H-H-H	H-H-H-H		
阳平 (T2) 阳去 (T6) 阳入 (T8)	LM	L-H	L-H-H	L-H-H-H	L-H-H-H-H	
		L-HL	L-H-M	L-H-M-M	L-H-M-M-M	
			L-H-L	L-H-L-L	L-H-L-L-L	
阴上 (T3) 阴去 (T5) 阴入 (T7)	MH	H-H	H-H-H	H-H-H-H	H-H-H-H-H	
			H-M	H-M-M	H-M-M-M	H-M-M-M-M
	H	H-L	H-L-L	H-L-L-L	H-L-L-L-L	
阳上 (T4)	LM	LH-H	LH-H-H	LH-H-H-H	LH-H-H-H-H	
			LH-M	LH-M-M	LH-M-M-M	LH-M-M-M-M
			LH-L	LH-L-L	LH-L-L-L	LH-L-L-L-L

(8) 显示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左到右，第一栏是按历史调类标示的变调组首字，第二栏是单字调，第三至六栏分别是两字、三字、四字、五字组变调形式。根据变调形式，八个调类可以归为四类：以阴平开首的变调组归为一类，其单字为 HL 调，两字组有两种可能，三字、四字组有四种可能，五字组有三种可能；以阳平、阳去、阳入开首的归为一类，

¹ 本人于 1999 年至 2001 年间曾先后调查过近五十位不同年龄层的宁波本地发音人，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市区，部分生活在郊区（包括镇海）。

² 声调前的数字表示与中古调类的关系，如 1 是阴平、2 是阳平、依此类推；除了五度值之外，在扩弧内加了三度值，即 H 表示高、M 表示中、L 表示低，下文描写连读变调时将只使用三度值，以便更好地观察变调现象。

其单字均为 LM 调，两字组有两种可能，三、四、五字组有三种可能；以阴上、阴去、阴入开首的归为一类，虽然阴上的单字调为 MH，阴去、阴入的单字调为 H，但它们的二、三、四、五字组变调模式相同，均有三种可能；以阳上开首的归为一类，虽然其单字调为 LM，与其它三个阳调同，但它的变调模式与它们截然不同，其二、三、四、五字组变调也均有三种可能。

2.3 变调规则

面对上节描写的宁波方言复杂的连续变调现象，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复杂的表层现象背后有没有深层的规则？同一变调环境有不同的输出结果，是否是不同的变调规则在起作用？如果是，不同的规则之间的关系如何？总之，我们希望可以弄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变调机制造成了宁波方言如此复杂的变调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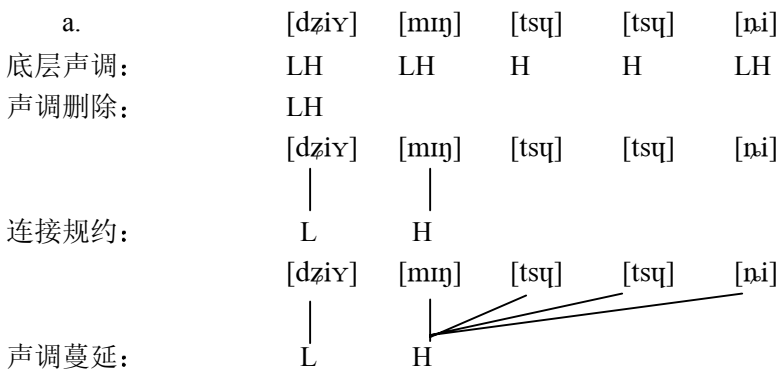
根据 (8) 中所显示的宁波方言一至五字组的声调模式，我们提出宁波方言有以下三个底层声调 (underlying tones): MH (T1), H (T3, T5, T7) 和 LH (T2, T6, T8, T4)。请注意 T4+X 展现了与其它三个声调不同的变调模式，我们认为它和其它三个声调具有相同的底层声调，只不过它有自己独特的连接规约 (association convention)，因此，它在词库中是有标记的 (marked)。根据修正的合法条件 (Well-formedness Condition, WFC): 连接线不能交叉 (Pulleyblank, 1983)，和强制性拱度原则 (the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OCP) (Leben, 1973, 1978; Goldsmith, 1976)，假定声调在词库中和声调连接单位是不连接的，并且规定每个声调必须和声调连接单位相连接，我们可以用以下语言特定的 (language-specific) 规则来推导宁波方言的表层声调：

- (9) **声调删除**：删除非最左面音节上的声调。
- (10) i. **连接规约**：将底层声调以从左到右、一对一的方式与各音节相连。
ii. **T4 连接规约**：将底层声调与第一个音节相连。
- (11) **声调蔓延**：将最右边的声调向余下的音节蔓延。
- (12) **声调降低**：将蔓延所得的声调降低为中调 M。
- (13) **缺省值调 (Default Tone)**³：如果声调蔓延和声调降低规则不运行，未连接声调的音节得到一个缺省的低调 L。

需要指出的是声调删除和连接规约是强制性执行的，而且，声调蔓延和缺省值调两项规则必须执行一项，但声调降低规则是可选择性的 (optional)。也就是说，如果声调蔓延规则运行，缺省值调规则将不会运行，但声调降低规则则可以运行，也可以不运行。正因为如此，同一个变调环境可以有不同的输出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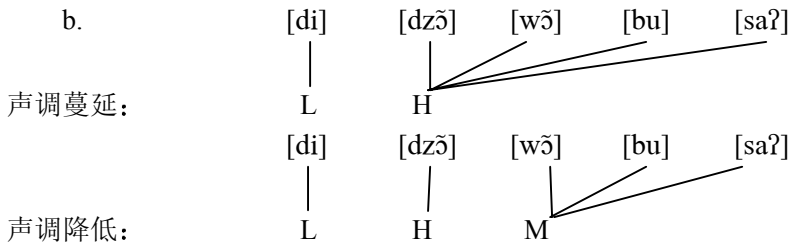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规则是如何工作的：

(14) 变调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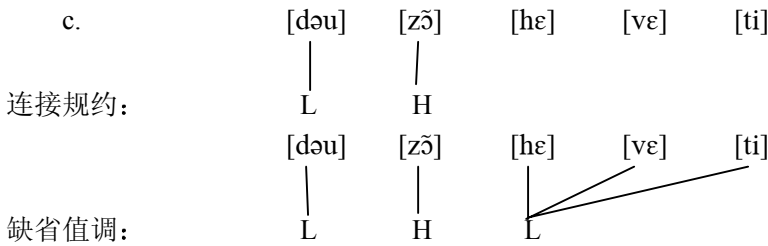


³ 如果声调降低规则可以循环运用至将声调将为 L，缺省值调规则可以不需要存在，这是另外一种分析方法，本文选择缺省值调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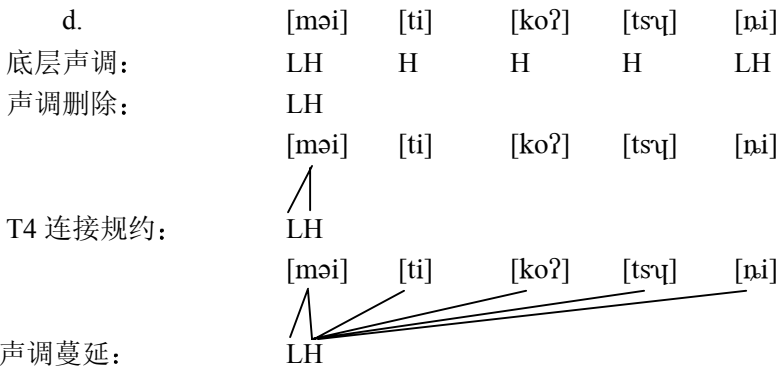
这就是“旧民主主义”正确的表层声调形式。下面看“地藏王菩萨”，它也经历如 a. 中的过程，然后，声调降低规则会运用到由声调蔓延所到的音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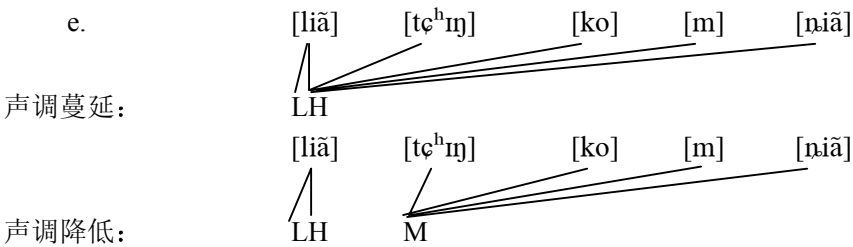
而对于“大上海饭店”，则声调蔓延规则不发生，它的推导是在声调删除、连接规约之后直接由缺省值调规则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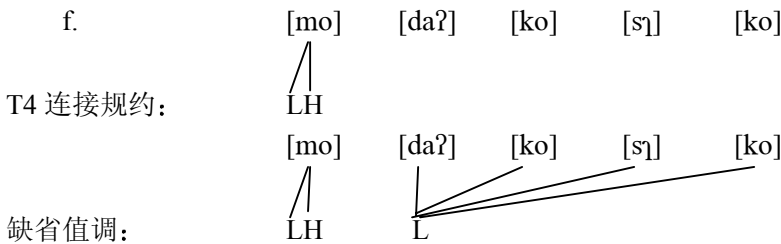
现在来看由 T4，即阳上调开首的例子。先看“美帝国主义”：



声调蔓延之后就是输出结果。而对于“两亲家母娘”，则在声调蔓延之后应用声调降低规则：



与 c. 类似，“马达加斯加”在连接规约之后直接应用缺省值调规则：



2.4 例外及解释

规则 (9) 至 (13) 解释了宁波方言变调的大部分材料，而且，解释了造成变调表层现

象复杂性的内部机制。但是，这些规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变调材料。

首先，规则没法解释两字组变调模式 M-HL、L-HL，以及一些零星出现的 L-LH 和 M-MH 模式。M/L-HL 模式主要出现在变调后字为平声时，即 X+T1/T2，L-LH 和 M-MH 模式主要出现在变调后字是上声时，即 X+T3/T4。注意到 HL、LH 和 MH 分别是阴平、阳上和阴上的单字调（LH 和 LM 不存在音位对立），因此，在这些变调模式中，后字的声调被保留，我们可以用以下（后字）忠实原则（Faithfulness Principle）进行解释：

(15) （后字）忠实原则（Faithfulness Principle）：

变调后字忠实于单字调，首字根据其所属调域得到一个缺省值调，阴调得到一个中调 M，阳调得到一个低调 L。

条件：忠实于 HL/当声调组合为 T1、T2 或 T6+T1 或 T2（即平声）；

忠实于 LH 或 MH/当变调后字分别为阳上或阴上。

（后字）忠实原则与（9）至（13）所提出的宁波变调主流机制处于竞争状态，因为并不是所有符合（15）中条件的情况都会根据忠实原则变调，至于何种变调会在一个声调组合中实现，取决于特定的说话人和他所说的那个具体的词。主流变调机制是种声调蔓延模式，从忠实原则的角度看是变调首字忠实于它的底层声调，因此我们可以将两种变调机制看作是忠实于首字或后字的参数设置之不同。可惜具体采用哪种变调机制已经无法预知（unpredictable）。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因为宁波方言的声调和变调情况正处于变化之中。具体讲，假设宁波方言处于由后字保留声调（即忠实于后字）的变调类型向前字保留声调（即忠实于前字）的变调类型转变之后期，那么上述现象就容易解释了⁴。

需要指出的是 M-MH 和 L-LH 的出现并不限于后字为上声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是儿化变调的结果，如[ŋa sã]外甥，虽后字为阴平，但变调为 L-MH。儿化音变和/或变调主要是个形态变化过程（a morphological process），它表述的是种小称意义。这种现象在南部吴语比较多见，在宁波，它也处在一种残留的状态（参见徐通锵，1985；陈忠敏，1992）。

其次，我们注意到有些单字调和所假定的地层声调有很大的不同。将 LM 写成 LH 是种音系学上的处理，两者并无音位上的对立，因此不成问题。但阴平和阴上的问题就很大了，阴平单字调为 HL，但底层却为 LH，阴上单字为 MH，底层却为 H，在此，我们不想提出一些相当人为的（ad hoc）的规则，如声调颠倒（Tonal Metathesis）和声调起首成分删除（Tonal Onset Deletion），来完成解释，我们只想指出：这种情况也许正说明单字调的演变和连读变调的演变是独立进行的，因为语言的基本使用单位是词，在具有丰富连读变调的吴语中，声调的演变是以词为单位的，而在单音节词和多音节历史演变的不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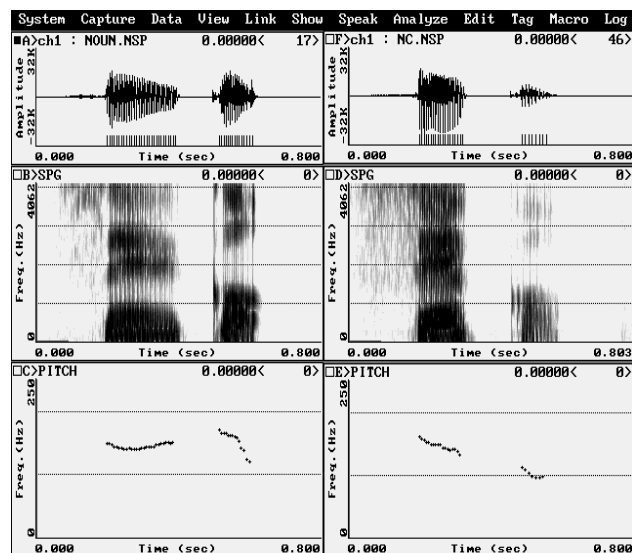
最后，也是最难解释的是以阴平开头的三字和四字变调模式 H-H-H 和 H-H-H-H。由于读这种模式的例子不多，相信应该是种后起的现象，可能的解释是音平调起首的变调组显示了一种和其它高调域声调相融的趋势，不过还仅处于扩散的初期。至此我们看到，在一个处于历史演变过程之中的语言中，要用完全共时的角度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是很困难的。

3. 宁波方言功能词变调现象

在一定条件下，吴语功能词（function words）会发生变调，其主要有二种方式：其一、功能词附加到相邻的实词（lexical items）上组成一个词汇层变调域，也就是词汇层变调域扩展到相邻的功能词上，如上海方言（参见：Jin, 1986; Selkirk & Shen, 1990; Zhang, 1992; Zee, 2001 等）；其二、功能词和相邻实词形成一特定的变调域，即附着组（Clitic Group，

⁴ 这个假设是有类型学上的证据支持的，因为北部吴语基本上是属于前字保留声调型，以上海、丹阳等为典型，而南部吴语则多是属于后字保留声调型，如温州、平阳、临海、仙居、黄岩等，而宁波则处于北部吴语的南端，因此保留一些南部的遗留特征并不奇怪。由于本文主题并不在此，因此关于此问题作者将另文论述。

CG), 在附着组内有特定的变调规律, 即附着组变调规则运行, 如崇明方言 (Zhang, 1992)。宁波基本上属于后一类型, 也就是说, 有一专门的、不同于词汇层变调的变调规则, 即附着组变调 (Clitic Tone Sandhi, CTS) 运用在功能词上。比如说, 实词[se koʔ]“三角”(意为“几何”)的变调形式为 M-H, 而数量结构[se koʔ]“三角”(意为“三角(钱)”)的变调形式则为 HL-L, 其各自的声调曲线如图一所示。但宁波附着组变调也显示了一定复杂性, 某些附着组会以一种类似于词汇层变调的方式进行变调, 本章下文将会结合语音材料进行具体分析。



[se koʔ] [se koʔ]
 ‘三角(几何)’ ‘三角(钱)’

图一: [se koʔ]“三角”(实词与数量结构)的声波图、宽带语图和声调曲线图

3.1 功能词与变调

本节将讨论宁波方言的主要功能词及其变调现象。

a. 疑问助词 (Question Markers)

[faʔ]“伐”是宁波一个常用的疑问助词, 附加在句末表示疑问:

(16) [fɛ ga iɔ faʔ] 番茄要伐 (番茄要吗?)

BT⁵: HL LH H H

SF⁶: [M H] [H L]

b. 体标记 (Aspect Markers)

宁波方言中常用的有三个持续体标记: [le/ləʔ ke]“来/勒该”、[le/ləʔ tei]“来/勒堆”、[le/ləʔ ton]“来/勒动”⁷, 两个完成体标记: [ləʔ]“勒”和[tsɿ]“仔”, 和一个经历体标记[kəu], 变调例子如下:

(17) [dʒi zəu ləʔ ke] 渠坐勒该 (他坐着)

BT: LH LH LH HL

SF: [LM] [L H L]

[ŋo ɕiɿ piɔ ta ton/tei] 我手表戴东/堆 (我手表带着)

BT: LH MH MH H HL

⁵ BT 是“基调”的缩写, 本文用“基调”主要是指底层声调, 但对于阴平调, 我们还是用它的单字调。

⁶ SF 是表层形式的缩写。

⁷ 注意: 普通话的“在”相当于宁波话的[ləʔ]和[le], [ləʔ]是介词, [le]是动词 (参见下文 h.)。

SF: [LM] [H L] [H L]

c. 属格标记 (Genitive) 和标句词 (Complementizer)

在宁波, 属格标记[goʔ]⁸“个”用于名词性成份与名次之间表示领属关系; 另一个[goʔ]“个”是标句词, 用来引导关系从句 (relative clauses); 而[ləʔ]“勒”则是一个用来引导补语从句的标句词。它们的变调例如下:

(18) [tɕiã se goʔ sɿ] 张三个书 (张三的书)

BT: HL HL LH HL

SF: [M HL L] [HL]

[tɕiã se io goʔ sɿ] 张三要个书 (张三要的书)

BT: HL HL H LH HL

SF: [M HL] [H L] [HL]

[kʰi læʔ tɕʰiŋ sɿ] 看勒清爽 (看得清楚)

BT: H LH HL MH

SF: [H L L L]

d. “把”和“被”

宁波方言的被动式标记是[piʔ/paʔ], 处置式标记是[tiʔ/paʔ]。例如:

(19) [pei tsɿ piʔ tɕiã se kʰo vu læʔ]

杯子被张三敲糊勒 (杯子被张三打碎了)

BT: HL MH H HL HL HL LH LH

SF: [M H L] [M HL] [H L L]

[tɕiã se tiʔ pei tsɿ kʰo vu læʔ]

张三把杯子敲糊勒 (张三把杯子打碎了)

BT: HL HL H HL MH HL LH LH

SF: [M HL L] [M H] [H L L]

e. 指代词

宁波只有一个基本指示代词[kirʔ]“该”, 但在多音节的指示代词中, 带语素[dɔ]“荡”的表示近指, 如[dɔ ti]“荡底”表示“这里”, [kirʔ ti]“该底”表示“那里”。宁波六个常用人称代词列表如下:

(20) 人称代词

ŋo LM 我 (第一人称单数) aʔ laʔ H-L 阿拉 (第一人称复数)

nəu/ŋ LM 尔 (第二人称单数) na LM/ ŋ naʔ LM-L 尔拉 (第二人称复数)

dzi LM 渠 (第三人称单数) dziʔ laʔ L-H 渠拉 (第三人称复数)

下面是宁波指代词变调的例子:

(21) [ŋo ciã ma kirʔ pəŋ sɿ] 我想买该书 (我想买这/那本书)

BT: LH MH LH H MH HL

SF: [LM] [MH] [LM L L] [HL]

[tã ŋo ŋ tsɿ] 打我儿子

BT: MH LH LH MH

SF: [H L] [L H]

[ziã dziʔ laʔ aʔ paʔ] 像渠拉阿伯 (象他的爸爸)

BT: LH LH LH H H

SF: [LM L L] [M-H]

f. 量词 (classifiers, measures)

⁸ [goʔ]有一弱化形式[fiəʔ]为它的自由变体。

与其它方言一样，宁波的量词位于数词和名词之间，不同类别的名词需要不同的量词。例如：

- (22) [se goʔ ɲiŋ] 三个人
 BT: HL LH LH
 SF: [HL L] [LM]
 [ŋ tsaʔ kəʔ] 五只狗
 BT: LH H MH
 SF: [LML] [MH]

g. 量化词 (quantifiers)

在宁波，如果数词[ɪʔ] “一”、[liã] “两”等如果不是表述确切的数字，疑问词[tɕi] “几”等如果不表示疑问，那么它们可以和量词一起组成量化词。例如：

- (23) [tɕiã se goʔ liã goʔ ba jɿ] 张三两个朋友 (张三的两个朋友)
 BT: HL HL LH LH LH LH LH
 SF: [M HL L L L] [L HL]
 [tɕiã se goʔ tɕi tsaʔ pei tsɿ] 张三几只杯子 (张三的几只杯子)
 BT: HL HL LH MH H HL MH
 SF: [M HL L L L] [M H]
 [dɛu iʔ tsaʔ pei tsɿ paʔ ŋo] 驮一只杯子拨我 (拿一只杯子给我)
 BT: LH H H HL MH H LH
 SF: [LM L L] [M H L L]

h. 介词

在文献中，汉语的介词有时被叫做是“副动词” (coverbs)，因为它们有时表现得象介词，有时又象动词，尤其是最常用的“在”。在宁波，表示“在”的介词和动词有清晰的语音形式上的区分，介词是[ləʔ] “勒”、动词是[le] “来”，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前者是后者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的变调行为完全不同，例如：

- (24) [tɕiã se le ɕiã kɔ̃] 张三来香港 (张三在香港)
 BT: HL HL LH HL MH
 SF: [M HL] [LM] [M HL]
 [tɕiã se dən ləʔ ɕiã kɔ̃] 张三蹲勒香港 (张三住在香港)
 BT: HL HL LH LH HL MH
 SF: [M HL] [LM L] [M HL]
 [tɕiã se paʔ ləʔ pən sɿ paʔ ŋo]⁹ 张三拨勒本书拨我 (张三给了本书给我)
 BT: HL HL H LH MH HL H LH
 SF: [M HL] [H L L] [HL L L]

i. 后置词

方位标记 (localizers) 是典型的后置词 (postpositions)，它们一般位于名词短语 (NP) 的后面，如最常用的“里”。在宁波，除了名词性的“里”之外，还有一个副词性的后置词[ka/kaʔ] “介”，它跟在 NP 或者形容词短语 (AdjP) 后面，表示一种方式。后置词的变调例如下：

- (25) [tɕiã se le vɔ̃ ke li] 张三来房间里 (张三在房间里)
 BT: HL HL LH LH HL LH
 SF: [M HL] [LM] [L HL L]
 [tɕiã se loŋ dɔ̃ li ka tɕʰi ke ləʔ]
 张三弄堂里介去该勒 (张三从弄堂里走了)
 BT: HL HL LH LH LH H H HL LH

⁹ 注意：由于前一个[paʔ]是动词，后一个[paʔ]是介词，因此它们的变调行为完全不同。

SF: [M HL][L H L L] [H L L]
[tɕ^{hi}ɿŋ sɔ̃ ŋe ka kɔ̃] 清爽眼介讲 (清楚点地讲, 意即“讲得清楚点”)

BT: HL MH LH H MH

SF: [M HL L L] [MH]

j. 方向助词 (directional particles) 和结果助词 (resultative particles)

方向助词放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方向; 结果助词放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结果。例如:

(26) [tsɔy kəu tɕ^{hi}ɿ] 走过去

BT: MH H H

SF: [MH L L]

[toŋ ci zɿŋ dzoʔ ləʔ] 东西寻着勒 (东西找到了)

BT: HL HL LH LH LH

SF: [M HL][L H L]

k. 话语助词 (discourse particles)

宁波话中有两类话语助词: 一类是句末助词 (sentence particles), 如[goʔ] “个”, 表示陈述的意思; 另一类是话题标记 (topic markers), 如[zɿ] “是”、[fia] “也”、[so] “啥”等。例如:

(27) [toŋ ci zɿ ŋo t^hɔy goʔ] 东西是我偷个 (东西是我偷的)

BT: HL HL LH LH HL LH

SF: [M HL][LM L] [HL L]

[tɕiã se zɿ, biŋ kəu fia/so fe tɕ^hyoʔ goʔ]

张三, 苹果也/啥(勿要)吃个 (张三不喜欢吃苹果的)

BT: HL HL LH LH MH LH/H HL H LH

SF: [M HL L] [L HL L] [HL L L]

上述我们讨论的功能词, 不管其间的句法关系如何, 都和其前面的实词形成一个变调域。比如在(21)中, [dzɿrʔ laʔ] “渠拉”是后接名词标杆 (N') [aʔ paʔ] “阿伯”的标志词 (specifier), 它们是同一名次短语的直接组成成分, 但是[dzɿrʔ laʔ]并没有和[aʔ paʔ]组成一个变调域, 而是附着到前面的动词[zɿã] “象”上, 与之组成一个变调域。

l. 否定词

在宁波, 除了基本否定词[faʔ] “不”, 常用的还有[mɿrʔ] “没”和[fe] “(勿要)” (意为“不要”)。例如:

(28) [tɕiã se faʔ tɕ^{hi}ɿ ciã kɔ̃] 张三不去香港

BT: HL HL H H HL MH

SF: [M HL][M H] [M HL]

[tɕiã se mɿrʔ tɕ^{hi}ɿ ciã kɔ̃] 张三没去香港

BT: HL HL H H HL MH

SF: [M HL][H L] [M HL]

[tɕiã se fe tɕ^{hi}ɿ ciã kɔ̃] 张三(勿要)去香港

BT: HL HL HL H HL MH

SF: [M HL][HL L] [M HL]

m. 助动词 (Modals)

宁波常用的助动词有: [hɔ] 好 (意为“可以”), [wɛi] 会, [iŋ ke] 应该, 等。例如:

(29) [tɕiã se wɛi le goʔ] 张三会来个 (张三会来的)

BT: HL HL LH LH LH

SF: [M HL][LM] [LM L]

[tɕiã se ho le goʔ] 张三好来个 (张三可以来的)
 BT: HL HL MH LH LH
 SF: [M HL] [MH] [LM L]
 [tɕiã se iŋ ke le goʔ] 张三应该来个 (张三应该来的)
 BT: HL HL H HL LH LH
 SF: [M HL] [M HL] [LM L]

n. 连词

[taʔ/tiʔ] “搭” (意为“和”), [tɕiʔ sɿ] “即使”, [tʰiʔ bo] “贴防” (意为“万一”), 都是宁波话常用的连词。例如:

(30) [tɕiã se taʔ li sɿ zɿ bā jɿ] 张三搭李四是朋友 (张三和李四是朋友)
 BT: HL HL H LH H LH LH LH
 SF: [M HL] [H] [LM L] [LM] [M-HL]
 [tɕiã se tɕiʔ sɿ sā biŋ ləʔ] 张三即使生病勒 (张三即使生病了)
 BT: HL HL H MH HL LH LH
 SF: [M HL] [H L] [HL] [LM L]
 [tɕiã se tʰiʔ bō sā biŋ ləʔ ni] 张三贴防生病勒呢 (张三万一生病了呢)
 BT: HL HL H LH HL LH LH LH
 SF: [M HL] [H L] [HL] [LM L L]

o. 疑问词 (Wh-words)

宁波话中常用的疑问词有: [so] “啥” (意为“什么”), [so niŋ] “啥人” (意为“谁”), [tɕi] “几” (意为“多少”), [dəu ɕiə] “多少”, [aʔ li] “何里” (意为“哪里”), [wei so] “为啥” (意为“为什么”), [dza] “咋” (意为“怎么”), [dza mo kaʔ] “咋貌介” (意为“怎么样”), 等等。例如:

(31) [tɕiã se tsoʔ so laʔ] 张三做啥啦 (张三在干什么)
 BT: HL HL H H LH
 SF: [M HL] [H] [H L]
 [tɕiã se le aʔ li] 张三来何里 (张三在哪里)
 BT: HL HL LH H LH
 SF: [M HL] [LM] [M LM]

根据目前的讨论, 从其变调行为看, 我们可以将功能词分成三类: 功能词 a. 至 k. 是一类, 它们会附着在其前面的实词上形成一个变调域, 其自身的声调会被删除; 否定词自身形成一类, 它们的变调行为和第一类不同, 它们不是和前面的实词, 而是和后面的动词构成一个变调域; 助动词、连词、和疑问词是第三类,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构成自己的变调域, 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它们为什么不和其前面的实词构成同一个变调域的原因不同。在正常的话语中, 助动词有其自身的变调域, 但如果助动词是句子的焦点, 说话人想强调什么事情“应该”、“能够”或者“必须”发生, 那么, 助动词会和其后面的动词一起构成一个变调域, 例如¹⁰:

(32) [tɕiã se ho le goʔ] 张三好来个 (张三“可以”来的)
 BT: HL HL MH LH LH

¹⁰ 然而, 有一个很奇怪、但也很有意思的现象是: 当[wei]“会”被焦点化后, 它具有否定的意思, 例如 [tɕiã se wei le goʔ] [M-HL] [H-L-L] 的意思是“张三不会来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飘浮声调 (floating tone), 也即是, 高声调 H 来自否定词[faʔ]。最初的形式是[faʔ]H[wei]LH, 当否定词[faʔ]的音段被删除后, 其上的声调被保留下来, 然后词飘浮的高调被连接到助动词[wei], 这个分析的另一个证据是: [wei]有一个自由变体[vɛi]。

SF: [M HL] [H L L]
 [tɕiã se iŋ ke le goʔ] 张三应该来个 (张三“应该”来的)

BT: HL HL H HL LH LH

SF: [M HL] [H L L L]

因此,助动词被焦点化之后,它们的变调行为就和疑问词相似了。连词不和其前面的实词形成一个变调域的原因是因为其前面有停顿插入 (pause insertion)。至于疑问词,它们不和前面实词形成一个变调域的原因是焦点的作用。众所周知的是当疑问词引导特殊问句 (a context question) 时,它在句中自然地成为焦点,因为它包含新信息¹¹。然而当疑问词用作关系代词 (a relative pronoun) 引导一个关系从句 (a relative clause) 时,它将会附着到其前面的实词上形成一个变调域 (英语的例子可以参见: Shafer et al., 2000):

(33) [tsøY ləʔ aʔ li jY sɥ goʔ di fɕ]
 走勒何里有水个地方 (走到哪里有水的地方,意即“走到一个有水的地方”)

BT: MH LH H LH LH MH LH LH HL

SF: [M H L L] [LM] [MH L] [L H]
 kʰi tɔ so toŋ ɕi bi ni goʔ 看到啥东西便宜个 (看到什么便宜的东西)

BT: H H H HL HL LH LH LH

SF: [H L L L L] [L H L]

3.2 宁波附着组变调规则

功能词有时在一些文献又被称作附着词 (clitics)。从形态句法的 (morphosyntactic) 角度看,附着词混杂着词和词缀的双重性,正如 Sapir (1930, 第 71 页) 所指出的:“附着词既不是真的词缀,也不是独立成分 (指“词”——译注) 的并置。它具有前者的外部特征, ... 后者的内部特征”。有意思的是附着词在一些较近期的文献中被视为词组缀 (phrasal suffixes) (如: Klavans, 1985; Anderson, 1992)。从音系学的角度看,附着词和实词结合时也表现出某种混杂性,由于具体规则的不同,有些附着词表现得象独立的词,有些则象词缀 (参见: Nespor & Vogel, 1986, 第 145-149 页)。

Hayes (1984) 和 Nespor & Vogel (1986) 提出在韵律层级结构 (the prosodic hierarchy) 中应该有一个附着组 (the clitic group)。提出附着组的动机是: 有一些语言的一些音系规则只在附着组域内运行。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提到宁波功能词变调有一特定的规则,如图一所示,数量结构 [sɛ koʔ] “三角”的变调与复合词 [sɛ koʔ] “三角”不同。而且,在上面 4.1 中所举的多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 附着组变调规则 (以下简称为 CTS) 会强制性地删除功能词上的声调,然后指派一个缺省的低调给它们。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有时功能词的最左边音节也可能得到一个从其左面相邻的实词上连接剩余下来的声调成分。比如在(17)中,体标记 [ləʔ] 并未得到一个缺省的低调,而是从前面相邻的动词 [zɛu] “坐”处得到一个连接剩余下来的声调成分 [H]。下面我们结合相应的声调曲线图来分析几个例子:

(34) a. [tã ləʔ ŋo jiʔ tɕi] 打勒我一记 (打了我一下)

BT: MH LH LH H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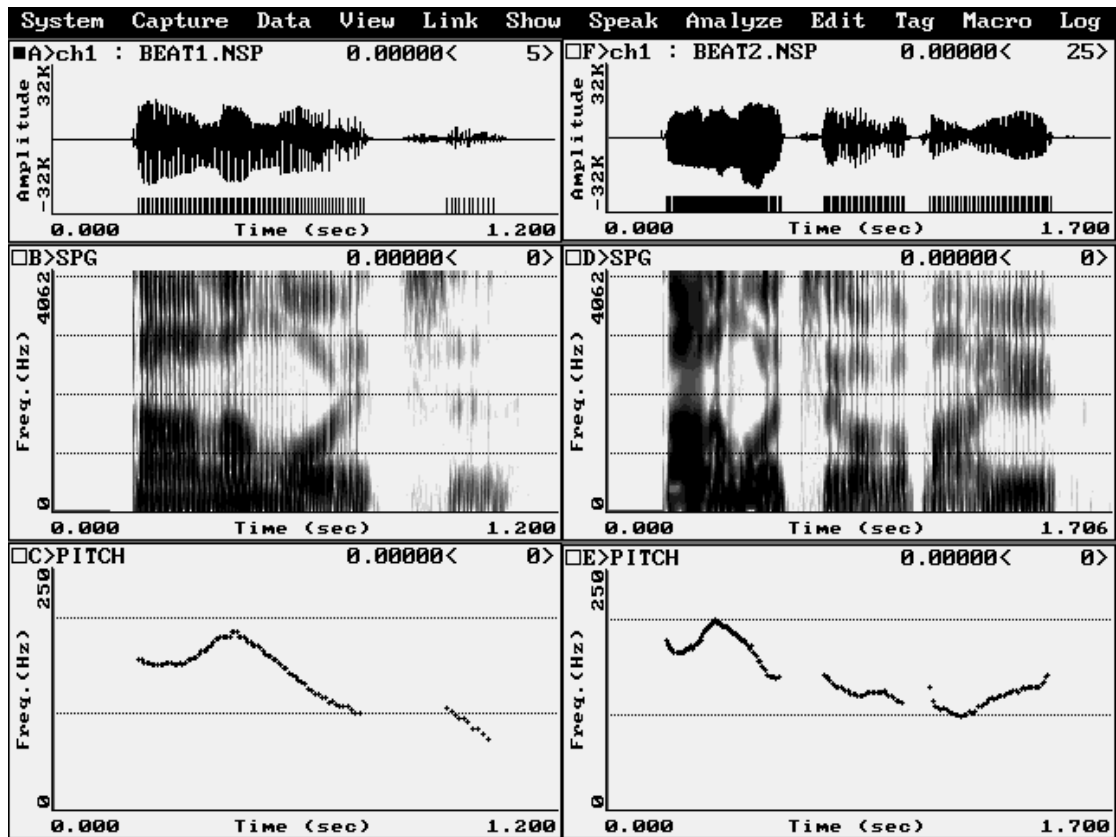
SF: [M H L L L]

b. [tã ləʔ ŋo jiʔ tɕi goʔ jiʔ goʔ bã jY]
 打勒我一记个一个朋友 (打了我一下的一个朋友)

BT: MH LH LH H H LH H LH LH LH

SF: [M H L L L L L L] [L HL]

¹¹至于宁波话焦点、韵律与变调之间的关系,我另有文有撰 (Hu, 2001), 此处不赘。



a. [ta ləʔ ɲo jiʔ tɕi] b. [tã ləʔ ɲo jiʔ tɕi goʔ jiʔ goʔ bã jyʔ]

图二：(34a)和(34b)的声波图、宽带语图和声调曲线图。

(34a)中，动词“打”后面跟着一个体标记、一个第一人称代词“我”和一个量化词“一记”；(34b)除了(a)中所述之外，还多一个标句词“个”和一个量化词“一个”。然而，(34a)和(34b)中的所有这些位于动词后的功能词在声调表现上都附着到其前面的动词上，构成一个变调域，也即是一个附着组 (CG)。从(34)中的材料及其相应的图二中的声调曲线图，我们观察到第一个功能词从其前面的动词处得到了一个声调成分 H。这是因为功能词与前面的实词构成一个变调域后，在自然连续语流中，实词上的声调拱度只有第一个成分与之连接，因而其剩余的声调成分就连接到了与之最近的无声调的音节上了，也就是说，功能词序列中的第一个音节最容易得到这一个连接剩余下来的声调成分。综合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将 CTS 的规则运用归纳如下：

(35) 宁波话附着组变调规则 (CTS)

- i. 声调删除：删除一个附着组内功能词上的声调。
- ii. 缺省值调：指派一个缺省的低声调给无声调的功能词。
- iii. 可选：功能词 (序列) 中的最左边音节可以从其左面实词上得到一个连接剩余下来的声调成分 H (如果有的话)。

CTS 在宁波是强制性运行的，在理论上，不管一个实词后面跟有多少个功能词，它们都将附着到其前面的实词上形成一个变调域。

至此，我们讨论了宁波话中附着组变调规则是怎样运行的，其中比较关键的一点是它与运用在复合词身上的词汇层变调不同。但有意思的是，它们两者有时碰巧是会一致的。比如一个阳去调单音节实词后接功能词时的变调模式是：L-H (-L-L-L...)，而以阳去调开首的复合词的变调模式则可能是：L-H (H-H-H-H)、L-H (M-M-M-M)或 L-H (L-L-L-L) (当然，如果

是双音节的话，也可能是 L-HL)，因此它们就有一致的可能性¹²。

4. 宁波方言附着组的定义

现在我们进入了本文最中心的议题，也就是句法和音系的接口关系 (the syntax-phonology interface)。在前一章，我们讨论了宁波方言功能词的变调现象，并假设了 CTS 运用的域就是一个附着组 (CG)。正如 Nespor & Vogel (1986: 149) 所指出的，定义一个韵律结构“必须依据非音系的标准”，因为否则便堕入了循环论证。在本章，我们将讨论决定宁波方言附着组的条件性因素 (the conditioning fact)。

在进一步深入之前，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必须区分功能词与非功能词，因为 CTS 只运用在功能词上，而不会运用到实词上，比如在 3.1 中的(24)，同表示“在”义的介词[ɬəʔ]“勒”发生 CTS，而实词[le]“来”并不发生 CTS。但在汉语及方言中，往往会发现有些功能词和实词的语音形式完全一样，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功能词是从实词演变而来的。比如宁波话中同动词有语音形式区分的表示“在”义的介词，在上海话及普通话中都是与动词具有相同的语音形式。在宁波，这种功能词与非功能词具有相同语音形式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需要加以区分，比如某些结果助词是从形容词虚化而来的，因而与形容词具有相同的语音形式，见(36)中的例子：

- (36) a. [zɿ ɕia hɔ] 字写好 (写完字了)
 BT: LH MH MH
 CTS: ok [LH] [H L]
 b. [zɿ ɕia hɔ] 字写好 (字写 (得) 好 (点))
 BT: LH MH MH
 CTS: * [LH] [H L]
 SF: ok [LH] [MH] [MH]

在(36a)中，[hɔ]“好”是个结果助词，表示动作[ɕia]“写”完成了，所以 CTS 运行；然而在(36b)中，[hɔ]是个形容词，作动词[ɕia]的补语，因此 CTS 不运行。

另外一个现象需要指出的是量化词的变调表现。在宁波话中（事实上所有的汉语均如此），数词[iɿʔ]“一”、[liã]“两”、[liã sɛ]“两三”等与量词组成量化词时，可以不表示确切的数目，如我们上文(23)中所指出的，此时它们会和前面的实词形成一个变调域。但是，当这些量化词表示确切的数目时，量化词将保留它们自己的声调，不会附着到前面的实词上去，如(37)中所示：

- (37) [tɕiã se goʔ liã goʔ ba jɿ] 张三两个朋友 (张三的两个朋友，表确切数目)
 BT: HL HL LH LH LH LH LH
 CTS: * [M HL L L L] [L HL]
 SF: [M HL L] [LH L] [L HL]
 [dɬu iɿʔ tsaʔ pei tsɿ paʔ ŋo] 驮一只杯子拨我 (那一只杯子给我，表确切数目)
 BT: LH H H HL MH H LH
 CTS: * [LML L] [M H L L]
 SF: [LM][M H] [M H L L]

Selkirk & Shen (1990) 在讨论上海话中的同类现象时，用句法上的“强”和“弱”来区分

¹² 从历史的角度看，宁波方言的声调正处于演变过程中，不仅单字调如此，变调模式也一样，而且，功能词上的变调也开始有和词汇层变调变得一致的趋势。从方言比较的角度看，有些方言的功能词变调不仅与词汇层不同、而且不同类别的功能词还有不同的变调方式（比如崇明，参见：张惠英，1979，1980；Chen，2000；Zhang，2001 等），而有些方言则根本不区分功能词变调和词汇层变调（比如上海，参见许宝华等，1988；Selkirk & Shen，1990；Zee，2001 等），而宁波方言则相信应该是处于由前一种方言向后一种方言演变的过程之中。

量化词的这种二重性，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太牵强，什么是“强”，什么是“弱”？¹³我们的解释是这里的区别是在语义上，当量化词表示确切数目时，其在语义上是[+确定的]（[+Specific]），当量化词表示非确切数目时，在语义上是[-确定的]。是语义上的不同使量化词的变调具有二重性。

4.1 基于边界条件理论的解释

我们上述分析的宁波功能词变调材料几乎完全符合 Selkirk 的边界条件理论（1986），因为宁波话的功能词总是附着到其左边的实词上。根据边界条件理论，句法与音系的匹配（the syntax-phonology mapping）对句法结构的依赖是极其有限的，也就是说，配对不受诸如管辖（dominance）、直接成分关系、成分控制等句法关系的制约。在决定韵律结构的某一特定单位中，唯一与句法有关的是：将句子分解成由某一特定 X-标杆单位成分组成的序列。根据第一章(4)中所引述的边界参数设定，对宁波的材料来说，答案显然是 (ib)，也就是说，一个句子中的每一个实词词汇项的左边界将会被标记为韵律域（此处是附着组，CG）的边界。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现依照边界条件理论提出宁波方言的附着组构成规则（the clitic group formation rule）：

(38) 宁波方言附着组构成规则

用#标记句中每个实词词汇项的左边界，两个#之间或者#与句末之间就构成一个附着组。

规则规定：不管其间的句法关系如何，功能词都会和其左边的实词组成一个附着组（CG）。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几个在 3 中讨论过的例子：

(39) [tɕiã se dən ləʔ ɕiã kɔ̃] 张三蹲勒香港（张三住在香港）

BT: HL HL LH LH HL MH

SF: [M HL][L H] [M HL]

[tɕiã se paʔ ləʔ pən sɥ paʔ ŋo] 张三拨勒本书拨我（张三给了本书给我）

BT: HL HL H LH MH HL H LH

SF: [M HL][H L L] [HL L L]

在第一个句子中，介词[ləʔ]“勒”和 NP[ɕiã kɔ̃]“香港”是组成 PP 的直接成分（IC），它们相互成分控制。但是[ləʔ]并没有和句法关系更接近的其后的 NP 形成一个 CTS 变调域，而是和其前面的动词[dən]“蹲”构成了一个变调域。在第二个句子中：(a)体标记[ləʔ]“勒”和量词[pən]“本”都运行 CTS 而和前面的动词构成一个变调域，但是，和[pən]一起共同组成句子的直接宾语的名词[sɥ]“书”却开始其自己的声调域；(b)动词的整个间接宾语，也就是 PP [paʔ ŋo]“拨我”与其前面的名词组成一个 CTS 变调域。这里，功能词和实词之间的句法关系对构成 CG 是完全无关的，(45)中所拟的附着组构成规则很准确地判定了句中 CG 的构成：首先，如(40)中所示，标记句中每个实词词汇项的左边界：

(40) 句一：#[tɕiã se]_N #[dən]_V ləʔ #[ɕiã kɔ̃]_N

句二：#[tɕiã se]_N #[paʔ]_V ləʔ pən #[sɥ]_N paʔ ŋo

然后，根据规则，两个#之间或者#和句末之间就是一个 CG。¹⁴

¹³ Soh (2001) 用 Lin (1994) 的 DP 结构理论来解释这种强弱之分，认为是定指[+definite]与非定指[-definite]的不同，但她的解释也有牵强之处，因为唯一的独立证据“非定指的（按照 Soh 的说法）NP，即非表示确切数目的 NP，如：两-量词-N，不能做主语或主题”（页 54 至 55）显然是错误的，因而她的论述也不免有循环（circular）之嫌。在者，Soh (2001) 和 Selkirk & Shen (1990) 均将这个问题和疑问词（Wh-word）变调现象的两重性放在一起讨论，我们认为这是不同的问题，疑问词的变调与否是由焦点决定的，此处量化词的变调与否是由语义特征决定的。Selkirk & Shen (1990) 更将上海话中作动词和介词的“在”混为一谈，然后又人为地区分为是“强”的和“弱”的功能词。

¹⁴ 否定词、助动词的变调域构成由于方式迥异，并牵涉到语义、焦点等因素，因而不在于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4.2 边界条件理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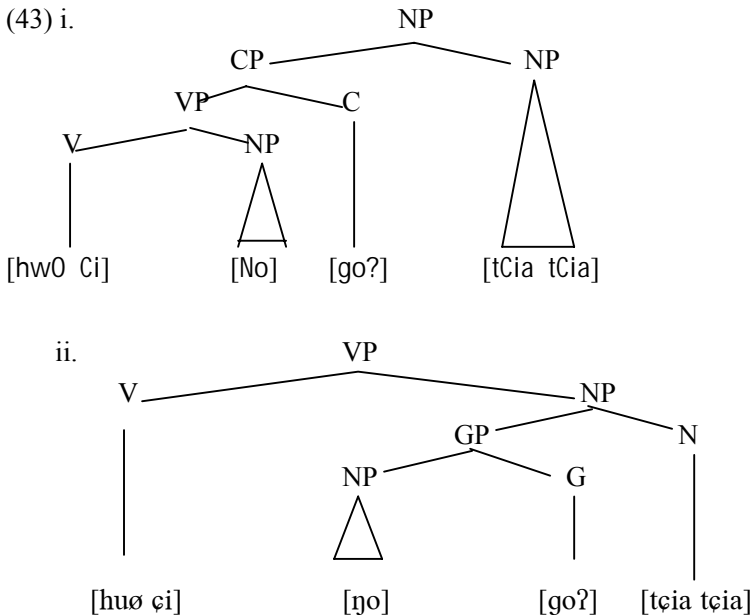
然而，边界条件理论会遇到问题，如果我们考虑更多的材料的话：

(41)	[huø	çi	ŋo	goʔ	tɕia	tɕia]	欢喜我个姐姐（喜欢我的姐姐，VP）
BT:	HL	MH	LH	LH	MH	MH	
CTS: *	[M	H	L	L]	[M	H]	
SF: ok	[M	H]	[LM	L]	[M	H]	
	[ts ^h əŋ	ŋo	goʔ	ŋ	tsɿ]		忖我个儿子(想我的儿子，VP)
BT:	MH	LH	LH	MH	MH		
CTS: *	[M	H	L]	[M	H]		
SF: ok	[MH]	[LM	L]	[M	H]		

根据(38)中的附着组构成规则，(41)两例中的人称代词[ŋo]“我”都必须和其前面的动词[huø çi]“欢喜”和[tɕiã]“想”分别构成一个附着组。然而在事实上，两例中的人称代词均开始其自己的声调组。显然，边界条件理论在这里行不通。更为复杂的事，(41)两例中的人称代词是可以附着到其前面的动词的，不过，整个词组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如(42)所示：

(42)	[huø	çi	ŋo	goʔ	tɕia	tɕia]	欢喜我个姐姐（喜欢我的姐姐，NP）
BT:	HL	MH	LH	LH	MH	MH	
CTS: ok	[M	H	L	L]	[M	H]	
	[ts ^h əŋ	ŋo	goʔ	ŋ	tsɿ]		忖我个儿子（想我的儿子，NP）
BT:	MH	LH	LH	MH	MH		
CTS: ok	[M	H	L]	[M	H]		

换句话说，类似(41)中的结构在句法上是有歧义的，它们具有VP和NP两读，以(41)和(42)中的第一个例句为例，其相应的句法树形图如(43)所示：



4.3 基于关系条件理论（the relation-based theory）的解释

如上节所指出，VP和NP歧义的结构中，如果是NP，CTS运行，如果是VP，CTS部运行，在这种情况下，边界条件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但问题是，有什么条件性因素决定了附着组的构成？本节我们将运用关系条件理论来解决问题。

根据关系条件理论（如：Kaisse, 1985; Hayes, 1989, 1990; Nespor & Vogel, 1986 等），

功能词附着到某一韵律单位上,如此处的附着组,与被附着的实词之间必须有某种句法关系,其中经典的条件性因素就是成分控制关系。然而在(41)和(42)的宁波方言材料中,不管何种形式的成分控制关系都不能解释附着组的构成与否。从(43)的句法树形图可见,在两种情形下(无论是 NP, 还是 VP),句中的动词均成分控制,同时也域成分控制(按 Kaisse, 1985 的定义,具体参见(2)中所述)其后的人称代词。但同时从树形图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是: NP 中的人称代词是动词的宾语,但这种动词-论元(argument)的关系并不存在于 VP 中的动词与人称代词之间。所以,这里宁波的例子说明需要有更严格的句法限制条件,其中的人称代词才会有附着化的现象出现。单纯的成分控制关系不足以让宁波的人称代词出现附着化,与前面的实词形成一个附着组,因而,句法条件需要进一步严格为成分控制下的动词-论元关系,也就是人称代词必须是动词的宾语。按照以上分析,宁波方言人称代词的附着组构成规则可以归纳如下:

(44) 宁波方言人称代词的附着组构成规则:

当人称代词是其相邻的实词词汇项的论元,并被其成分控制时,人称代词和该实词词汇项构成一个附着组。

规则很好地解释了 4.2 中的问题,而且,下面(45)中的例子也进一步证明规则作了准确的预测,当人称代词是动词的宾语时,人称代词将和动词构成一个附着组:

(45) [tɕiã se huø ɕi ŋo] 张三欢喜我(张三喜欢我)

BT: HL HL HL MH LH

CTS: [M HL] [M H L]

但不幸的是,关系条件理论在解释下面(46)中的材料时也会碰到问题:

(46) [huø ɕi ŋo tɕia tɕia] 欢喜我姐姐

BT: HL MH LH MH MH

CTS1: ok [M H L] [M H] (根据(38)中的附着组构成规则)

CTS2: * [M H] [LM] [M HL] (根据(44)中的附着组构成规则)

上例中的人称代词被前面的动词成分控制,但并不是动词的论元,因此根据(44)中的规则,人称动词应该形成其自己的附着组。然而事实是 CTS 运行到人称代词上,人称代词和其前面的动词构成一个变调域。也就是说,(46)种的人称代词并不按照(44)中的规则构成附着组,而是按照(38)中的规则构成附着组。因此,基于关系条件理论的解释在这里也并不可行。

4.4 解决方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纯粹的基于边界条件理论或关系条件理论的解释都会碰到困难。首先来看造成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46)中的人称代词在韵律上会发生附着化,而(41)中的却不会?在句法、语义研究中,一个普遍接受的假设是:无指的(non-referential) NP 和人称代词在语义上是有缺陷的,因此,无指的 NP 容易被吸入(incorporated)到其前面的动词中去,而人称代词则容易附着在其前面的动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就附着化来说,宁波的人称代词不应该被处理成一个特例,也就是说,(38)中的附着组构成规则也是运用到人称代词身上的,而(44)中所提出的附着组构成规则由于普遍性相对较差,只运用在人称代词身上、将人称代词处理成一种特例,所以必须被抛弃。这样,问题的关键就简化为:为什么(41)中的人称代词在韵律上不发生附着化?从相应的(43ii)的句法树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称代词处于 GP 的标记词(specifier)位置。在汉语中,属格标记在句法上是强特征的(syntactically feature-strong),其前面的 NP,或者是人称代词必须留在其原来的位置进行特征检验(feature checking)。因而,属格标记禁止其标记词有任何性质的移位(movement)、吸入操作(incorporation)、或附着化,否则,句子将会不合语法。这就是(41)中的人称代词不发生韵律上的附着化的原因。现在,我们可以将宁波方言附着组构成规则修正如下:

(47) 宁波方言附着组构成规则:

用#标记句中每个实词词汇项的左边界,两个#之间或者#与句末之间就构成一个附着组,除非遇到人称代词被属格标记支配(dominated)的情况,那将阻止在人称代词前插入#。

根据(47)中最终修订版的附着组构成规则,宁波方言附着组构成是音系学上一种典型的阻断型的(blocking)个案。也就是说,普遍的边界条件性的句法-音系匹配关系被一种特殊的句法结构关系所阻断。

5. 结论

本文具体描述了宁波方言功能词变调现象,并讨论了所牵涉的句法-音系接口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 总体上讲,宁波方言功能词变调与词汇层变调不同,有一附着组变调规则运用于附着组这一特定的韵律域内,这支持 Hayes (1989)、Nespor & Vogel (1986) 等人所提出的附着组假设。宁波方言的附着组的组成成分是:一实词词汇项,其作用是充当附着体(the host),以及其后的功能词(如果有的话),它们被强制性地附着到其左面的附着体上。显而易见的是虽然附着组主要是在句法词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附着组并不一定与任何句法范畴(如:词)具有同构(isomorphic)关系。CTS 的运用可以跨越各种各样的句法边界(boundaries),比如:在(19)的例子中跨越主谓边界(Subject-Predicate)、在(21)和(24)的例子中跨越动词-宾语边界(Verb-Object,包括 V-NP 或 V-PP)、在(23)的例子中跨越名词修饰语之间的边界(Modifier-Modifier(-N))、在(23)和(24)的例子中跨越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之间的边界(Direct Object-indirect Object)、在(33)的例子中跨越主句与关系从句之间的边界(VP-CP)等等。

(2) 至于句法-音系的接口关系,宁波方言基本上是个边界条件决定的个案(an end-based case)。不管其间的句法关系如何,功能词都会强制性地附着到其左面相邻的实词词汇项上,形成一个附着组。然而,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也就是当人称代词被属格标记支配时,句法关系的限制进入音系,阻断普遍性的边界决定性质的句法-音系匹配规则。

参考文献:

- Anderson, S. (1992). *A morphous Morp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 N. (1985). Tone sandhi phenomenon in Ningponese. *Fangyan*, 1: 15-27.
- Chen, M. (1985). The syntax of phonology: Xiamen tone sandhi. Ms, UCSD.
- (1987). The syntax of Xiamen tone sandhi. *Phonology Yearbook*, 4: 109-149.
- (1990). What must phonology know about syntax? In Inkelas & Zec (eds.), 19-46.
- (2000). *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陈忠敏(1992) 宁波方言“虾猪鸡”类字声调变读及其原因,《语言研究》23期,72-77页。
- (1993) 宁波方言声调变异,《中国语文》236期,367-373页。
- Chao, Y. R. (1928). *Studies in the Modern Wu Dialects*. Peking: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Monograph, 4.

- (1930).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itre Phonétique*, 45: 24-27.
- (1967). Contrastive aspects of the Wu dialects. *Language*, 43: 92-101.
-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uanmu, S.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Ph.D. Dissertation, MIT.
- Fromkin, V. ed. (1978). *Tone: A Linguistic Surve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傅国通、方松熹、蔡勇飞、鲍士杰、傅佐之 (1985), 《浙江吴语分区》, 《杭州大学学报增刊》9、10 期。
- Goldsmith, J. (1976). *Autosegmental Phonology*. PhD dissertation, MIT. New York: Garland Press, 1979.
- (1990). *Autosegmental and Metrical Phonology*. Oxford &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Haegeman, L.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2nd),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 Hayes, B. (1984). The prosodic hierarchy in met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tanford Conference on Meter. In Kiparsky & Youmans (eds.) (1989) *Rhythm and Meter*, 201-260.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1990). Precompiled phrasal phonology. In Inkelas & Zec (eds.), 85-108.
- Hu, F. (2001). Focus, prosody, and tone sandhi in the Ningbo Wu. Paper presented at IACL-10/ NACCL-1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Hyman et al. (1987). Luganda and the strict layer hypothesis. *Phonology Yearbook*, 4: 87-108.
- Inkelas, S. & D. Zec. (1990). *The Phonology-Syntax Conne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in, S. (1986). *Shanghai Morphotonem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 Kaisse, E. (1985). *Connected Speech*.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Kennedy, G. (1953). Two tone patterns in Tansic. *Language*, 29: 367-373.
- Kiparsky, P. (1982). From cyclic phonology to lexical phonology. In Harry van der Hulst & Norval Smith (eds.). *The Structure of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Vol. 1: 131-176.
- (1985). Some consequences of lexical phonology. *Phonology Yearbook*, 2: 83-138.
- Klanvans, J. (1985). The independence of syntax and phonology in Cliticization. *Language*, 61: 95-120.
- Ladd, R. (1986). Intonational phrasing: the case for recursive prosodic structure. *Phonology Yearbook*, 3: 311-340.
- Ladefoged, P. (1975, 1982, 1993). *A Course in Phone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Leben, W. (1973). *Suprasegmental Phonology*. Ph.D. dissertation, MIT.
- (1978). The representation of tone. In Fromkin (ed.), 177-219.
- Lehiste, I. (1970). *Suprasegmental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1972). The timing of utterances and linguistic boundarie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51: 2018-2014.
- (1973). Phonetic disambiguation of syntactic ambiguity. *Glossa*, 7: 107-122.
- Lin, J. (1994). Lexical government and tone group formation in Xiamen Chinese. *Phonology*, 11: 237-276.
- Mohanan, K. (1982). *Lexical Phonology*. PhD dissertation, MIT.
- (1985). Syllable structure and lexical strata in English. *Phonology Yearbook*, 2: 139-155.
- (1986). *The Theory of Lexical Phonology*. Dordrecht: Reidel.
- Nespor, M. & I. Vogel. (1986). *Prosodic Phonology*. Dordrecht: Foris.
- Odden, D. (1987). Kimatuumbi phrasal phonology. *Phonology Yearbook*, 4: 13-36.
- Pulleyblank, D. (1986). *Tone in Lexical Phonology*. Dordrecht: Reidel.
- 钱乃荣 (1990) 宁波方言新派音系分析, 《语言研究》总第 18 期, 118-125 页。
- Rose, P. (1989).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Yang Tone Phonation Types in Zhenhai.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8: 229-245.
- (1990). Acoustics and phonology of complex tone sandhi. *Phonetica*, 47:1-35.
- (1994). Renewing the connection: acoustics and phonology of two lexical trisyllabic tone patterns in Zhenhai.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412-418.
- Sapir, E. (1930). Southern Paiute, a Shoshonean language. Cited in Nespor & Vogel (1986).

- Selkirk, E. (1980). The role of prosodic categories in English word stress. *Linguistic Inquiry*, 11: 563-605.
- (1984). *Phonology and Syntax: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1986). On derived domains in sentence phonology. *Phonology Yearbook*, 3: 371-405.
- Selkirk, E. & T. Shen. (1990). Prosodic domain in Shanghai Chinese. In Inkelas & Zec (eds.), 313-337.
- Shafer, A., K. Carlson, C. Clifton, & L. Frazier. (2000). Focu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itch accent: disambiguating embedded question. *Language and Speech*, 43: 75-105.
- 施文涛 (1979) 宁波方言本字考, 《方言》第 3 期, 161-170 页。
- Soh, H. (2001).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honological phrasing in Shanghai and Hokkien.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 37-80.
- 汤珍珠、游汝杰、陈忠敏 (1990) 宁波方言 (老派) 的单字调和两字组变调, 《语言研究》18 期, 106-117 页,
- 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 (1997) 《宁波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汪平 (1990) 宁波方言连调的探讨, 《语言研究》19 期, 9-14 页。
- 徐通锵 (1985) 宁波方言的“鸭” [ɛ] 类词和“儿化”的遗迹, 《中国语文》186 期, 161-170 页。
- (1991) 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 《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
- Zec, D. (1988). *Sonority Constraints on Prosodic Structure*.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Zee, E. (2001). Shanghai phrasal phon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u dialects. Suzhou University.
- Zee, E. & I. Manddieson. (1980). 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Shanghai: phonetic evidence and phonological analysis. *Glossa*, 14: 45-88.
- Zhang, H. (1992). *Topics in Chinese Phrasal Tonology*. PhD dissertation, UCSD.
- (2001). The morphology-phonology interface: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IACL-10/NACCL-1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张惠英 (1979) 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第 4 期, 284-302 页。
- (1980) 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 《方言》第 1 期, 15-34 页。